

故影遗存

图解天津人文史 · 白文源 编著



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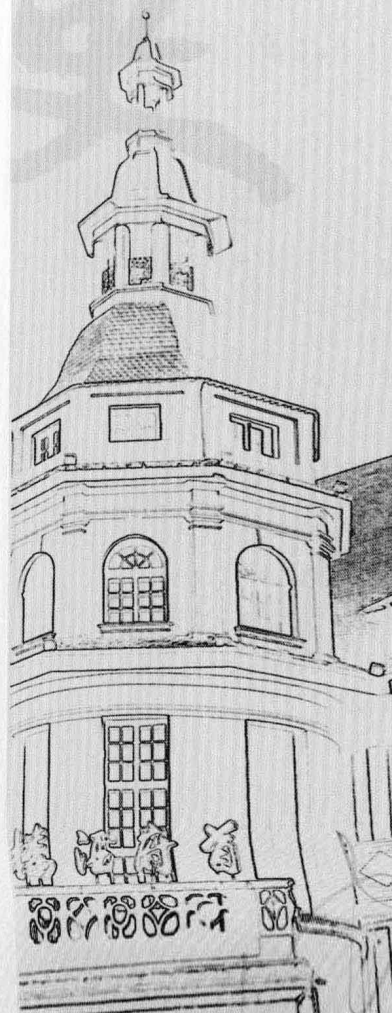
故影遗存

图解天津人文史

白文源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影遗存：图解天津人文史 / 白文源编著.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3-029550-7

I. ①故… II. ①白… III. ①文化史—天津市—图解 IV. ①K292.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5012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 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谭 硕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年1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印数：1-1 500 字数：360 000

定价：20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天津人文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天津的人文特征是一个说不清的难题。有人讲“没特点是天津人文的特点”，有人讲“天津人文的特点就是杂”，也有的把人文特点简单地解释为经济的附属物，于是出现盐文化、码头文化，等等，似乎任何经济现象后面加上文化两字即可。

依我看，对天津人文的探讨，不能光“观察”，还要会“化验”。白文源先生新作《故影遗存——图解天津人文史》把人文分为八个系统，这就为“化验”提供了科目和剖面；用“图说”作为该书的基本叙事手段，这就使读者可以从容地“看片子”，从而更加客观地对天津人文进行思考。

天津人文的纷繁现象肇因于两类城市基因：一是移民。皖北、苏北、华北等八方民众汇集津门，择地而居，以邻为善，绝无保守思想和传统偏见；二是开埠。西方现代文明蜂拥而至，在激活经济的前提下，新的人文理念扑面而来，与天津移民性格不期而遇，成功嫁接。

这两种基因的可融性，带来了中西文化的交汇，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交汇，南北文化的交汇，传统文化和时尚文化的交汇，民俗文化和风雅文化的交汇，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汇。因此，天津人文的定位，已绝非是行业性、区域性的文化概念，而是表现为整个城市多元、包容与开放的人文特征。

形成这样的人文特征，要经过“交汇、融合、升华”三个阶段。

“化验”天津人文更应注意它的“升华”，也就是文化现象的“都市化”，这一点尤为重要。研究天津人文并非是寻找“原生态”，而是研究“都市化”的过程，找出我们天津人文的发展规律，所谓的借鉴恐怕贵在于此。

绪 论

人文，是指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总汇。人文史就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人文史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科学、法律、建筑、哲学、历史、宗教、文学、美术、电影、音乐、神话、心理、伦理、戏曲、新闻、出版、体育、人权等。天津作为首都北京的东大门，又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拥有极其丰厚的历史资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天津人文史，就是要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为现代天津的发展提供借鉴。因篇幅所限，本书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建筑、文化、艺术、宗教等八篇。

一、天津地区自然地理概况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部，海河流域下游，北依燕山，东临渤海，南北长约186公里，东西宽约101公里，周长919.53公里，其中陆界长766.2公里，海岸线长153.33公里，地理位置在北纬 $38^{\circ}34'$ ~ $40^{\circ}15'$ ，东经 $116^{\circ}43'$ ~ $118^{\circ}00'$ 之间，与首都北京同处于国际时区的东8区。

天津土地总面积11919.7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755平方公里，平原面积11164.7平方公里。

天津的地理环境可归纳为“一湾、一水、片山、二原”。“一湾”即渤海湾；“一水”即天津市地域均在海河水系包围中；“片山”即天津市北部燕山余脉小片山区；“二原”是两片平原，即以（北）京山（海关）铁路天津至塘沽段为界，铁路线以北为冀东平原，以南为冀中平原，两者均属华北平原。

天津虽然地近渤海，但全市气候却属于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夏日炎热，春秋则很短促。在一年四季中，冬季最长，约为166天；夏季稍短，约为100天；春秋两季仅各占50~55天。与此相对应的是天津全年降水量极不均匀，夏季降水约占全年的70%，易造成河槽漫溢，堤坝时有冲决之虞，致使水患多发；冬季降水只占全年的2%，而春季则时常晴空万里，多干热风，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这对于沿海滩涂的晒盐极为有利，但常使禾苗枯萎，农业受损。此种气候特征使得天津历史上经常出现春旱秋涝的灾害。

天津地势总体呈现“北高南低”的态势，状似簸箕，最高处为蓟县下营常州村的九山顶



（海拔高度1078.5米），最低处为大沽口（海拔高度0米）。

天津地处海河流域下游，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和北运河）的汇合处和入海口，也是子牙新河、马厂减河、独流减河、永定新河、潮白新河、蓟运河等河流的入海地，故有“九河下梢”、“五河尾闾”之谓。

天津境内探明的矿产资源达36种，其中具有利用价值的矿种有29种，列入国家矿产储量表的有17种，主要为煤、锰、铁、金、石油、天然气等。

天津曾是一片沉寂古老的土地，距今已有11亿年的中上元古界地层广泛分布在天津北部的蓟县大地上，只是在距今4000年前才形成包括市区在内的天津平原。

二、古代天津人文史

天津的人文历史既古老又年轻。说她古老，是因为北部蓟县一带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距今1万年前；说她年轻，是因为市区的人文历史不过700余年。2009年3~5月，考古工作者在蓟县北部地区开展全面的考古调查，共发现距今1万年

前的旧石器时期晚期遗存27处，采集到各类石质人工制品近千件，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刮削器、尖状器、钻器、砍砸器等，表明这个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多样性。这些发现填补了天津作为直辖市区域范围内旧石器文化的空白。

进入新石器时期后，天津北部蓟县地区人类活动逐渐增多，目前主要的发现有青池遗址第一期遗存（距今8000~7000年前）、青池遗址第二期遗存（距今7000~6000年前）和下埝头遗址第一期遗存（距今7000~6000年前）、下埝头遗址第二期遗存（距今6000年前）、围坊遗址一期文化遗存（距今5000年前后）、张家园遗址第一类遗存（距今4500年前后）以及弥勒院遗址（距今4000年前）等。

距今8000~5500年前，渤海内侵，天津境内除蓟县北部地区外全部沉入海底，这次海侵，被称为“天津海侵”。此后不久，受全球气候变冷、海面下降的影响，渤海的海岸线开始后退。在退海成陆的过程中，共发生过4次相对稳定的停顿，每次停顿的时间在1000年左右，由此形成了4道古海岸线的遗迹——贝壳堤。大港区翟庄子附近发现距今4700年前遗留下来的贝壳堤，表明以西地区成陆；东丽区张贵

庄、津南区巨葛庄、大港区沙井子一带发现距今3800年前遗留下来的贝壳堤，表明以西地区成陆，天津市区大抵就在这一时期凸出海面成为陆地；东丽区白沙岭和军粮城、津南区西泥沽和邓岑子、大港区上古林和马棚口等地发现距今2600年前遗留下来的贝壳堤，表明以西地区成陆；塘沽区东大沽和高沙岭一带发现距今700年前（即宋、元时期）遗留下来的贝壳堤，表明以西地区成陆。此后，渤海西岸的海岸线基本稳定下来，形成如今的海陆分布形式。

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时期，由于天津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尚未成陆，因而除蓟县北部地区和宝坻区发现一些遗址和墓葬（如张家园第二类遗址、围坊第二期遗址、围坊第三期遗址和宝坻区牛道口东周墓葬）之外，其他地区尚未发现人类遗存。直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天津境内部分地区已经成陆，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聚落出现了，人类遗存也相应增多。迄今为止，天津近郊已发现战国时期文化遗存23处。秦汉时期，天津地区分属右北平郡、渔阳郡和渤海郡；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津地区分属章武郡、浮阳郡。在此期间，法兴寺（俗称北少林寺）在蓟

县盘山建成，成为天津地区最早的寺庙。北齐文宣帝天宝年间（550~560年），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北齐王朝开始在蓟县山区修建长城（另一说蓟县长城始建于隋初）。隋唐时期，天津地区分属河间郡、涿郡、渔阳郡、幽州、沧州、蓟州。唐贞观十年（637年），蓟县大佛寺（即独乐寺）建成（后于辽统和二年〈公元984年〉重建）。

宋辽时期，两国以派水为界河（派水即今大清河和海河），天津地区被分为南北两部分。界河以北属辽朝幽都府（后改名为“析津府”），界河以南地区属宋朝高阳关路乾宁军。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辽被金朝所灭。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亦被金朝所灭，天津地区并入金朝版图。

金朝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金王朝将都城迁至燕京（今北京）。为保障漕运和盐业的安全，大约在金宣宗贞祐年间（1213~1217年），金朝廷在三岔河口地区（今狮子林桥附近）设置“直沽寨”。“寨”为宋朝首设，金朝沿用，为设置于险要之处的基层军事建制。

元朝建立后，亦出于保护漕运和盐业的考



虑，于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在直沽寨旧址附近设海津镇。“镇”自北魏成为一级军事建制后，历朝历代多有设置，元朝时为屯兵戍守之所。

为祈求神灵保佑漕运安全，延佑七年（1320年）元朝廷在今河东大直沽地区建设“灵慈宫”（即“天妃宫”），后被焚毁。泰定三年（1326年），又在三岔河口地区建起第二座“天妃宫”（即“天后宫”）。这两座天妃宫为天津市区最早的庙宇。

明建文二年（1400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发动了旨在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同年九月（10月），朱棣率军由通州循河而下，渡直沽，昼夜兼行，随即攻破沧州，从而打通了南下的道路。朱棣所循之河为潞河（北运河），所渡之河为卫河（南运河），其渡河之处即在天津旧城北门外之渡口处。

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攻破南京，夺得帝位，改年号为“永乐”，并将北平更名为北京。朱棣久戍北平，深知直沽之于北京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直沽为河、海漕运重要的中转站和南北商贩往来要冲，应设“卫”以戍守。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

日），明朝廷于直沽设天津卫，“天津”从此得名。同年十二月初九（1405年1月9日）明廷添设天津左卫，同时下令筑城浚池（卫城选址于卫河与海河交汇处西南的三角地带）。永乐四年十一月初八（1406年12月18日）再设天津右卫（天津右卫原系山东都司青州左护卫，是由山东青州调防而来）。

按照明朝兵制，“卫”是京师和各地普遍设置的一种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军事组织，受各省都指挥使司节制，统由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各卫所中每10人编为一个小旗，设旗长；每50人编为一个总旗，设总旗长，下辖5个小旗；每112人编为一个百户所，设百户长，下辖2个总旗；每1120人设一个千户所，设千户长，下辖10个百户所；每5600人编为一个卫，设指挥使（正三品），下辖5个千户所。

弘治三年（1490年），为管理天津至德州运河沿岸军民事务，明朝廷特设天津道，地位权限高于天津三卫。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为加强海上防务，明廷又决定设一巡抚（简称“天津巡抚”），总控天津、登州、莱州等地。

永乐二年（1404年），为防止鞑靼侵扰，

加强山海关至昌平长城一线的防务，明王朝设置了以蓟州命名的蓟州镇。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出任蓟州镇总兵官。在任期间，他大修防区长城，同时在练兵、制械、阵图演练等方面都作出不小贡献。戚继光在任16年，鞑靼不敢犯境，天津地区得享安宁。

随着天津经济文化的逐渐繁荣，“卫”的军事建置已不能适应城市成长的需要。清顺治九年（1652年），清政府将天津三卫合而为一。雍正三年（1725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散州，级别与县同），同年九月（10月），升天津州为直隶州（清制，凡不设府而仍辖有县之州为直隶州，隶属于省布政使司，级别低于府而高于县），辖武清、静海、青县三县。雍正九年（1731年），清政府又将天津升格为“府”（附郭设天津县），下辖沧州、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天津共一州六县。这种行政建置层序，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天津的非军籍居民也相应增多，文教事业取得了一定进步。明正统元年（1436年），天津城区出现了本地最早的学校——天津卫学。随着科举教育的深入与普及，有明一代天津县共有9人考取进士（其中

刘钰于成化二年（1466年）考中进士，为天津地区首名进士）。时至清初，由于清王朝推行偃武修文、崇尚文治的政策，文化教育事业更得到不断发展，一大批文人寓居天津。同时，以查氏家族为代表的天津盐商亦修饰苑囿，广建园林，为津门文人墨客吟诗作画提供了最佳场所。由于教育的不断进步，有清一代天津共有128人考取进士。与此同时，民间艺术也得到飞速的发展，戏剧、曲艺在天津大放异彩，初步打下天津“戏剧之乡”、“曲艺之乡”的基础。

三、近代天津人文史

由于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早在清顺治年间，天津即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政府派出以马嘎尔尼（G.M. Macartney）勋爵为特使的大型使节团以补祝乾隆八十寿诞的名义前往中国。该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1793年7月29日）抵达大沽口，七月初五（8月11日）到达天津的三岔河口。使团对天津的繁华十分欣赏。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提出除广州之外，再将天津、宁波、舟山等处开辟为通商口岸，遭到



清政府拒绝。

英国社会十分喜欢中国生产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为获得这些商品，英国每年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白银。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英国产品在中国没有销路，中英贸易完全呈现出有利中国的一边倒局势。英国政府急于想改变贸易不平衡问题，因此，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就对中国进行鸦片走私贸易。天津靠近渤海，又接近贵族官僚集中的北京，自然深受英国鸦片商人“垂青”，从而成为鸦片在中国北方销售的主要市场。

道光十二年（1832年），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W.Jar-dine）开始直接向天津走私鸦片，此后天津的走私鸦片逐渐增多。道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1838年11月5日）直隶总督琦善在奏疏中写道：除以前查获的鸦片共29000余两外，九月初九（10月26日）于大沽口“金广兴”号上查获鸦片82袋计重131536两，并同时起获大批烟具。随后，天津地方官府在小西关地区使用铁锅熬焦油的办法销毁了上述两批共160000多两鸦片。有资料表明，在林则徐接受委派赴广州禁烟时，道光帝曾将琦善的奏折交其阅

看。林则徐认为天津销烟的方式费时费力，成本也高，销毁并不彻底，其渣滓仍可吸食。他到广州后，摒弃天津销烟方式，而采用在海边挖掘水池、以生石灰销毁鸦片再开闸将残渣倾入大海的办法彻底销毁鸦片。

清朝中央政府及各地官府坚决销烟的举措沉重打击了英国鸦片贩子的利益。为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许多鸦片贩子上书英国政界人士，叫嚣使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

道光十九年（1839年），英国政府决定抵制清王朝的禁烟运动，发动侵华战争。在广州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Elliot）于二月二十日（4月3日）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J.Palmerston），建议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其具体步骤是：封锁广州、宁波两港，武力占领舟山，在白河口（即海河入海口）向清王朝送达通牒。事实证明，英国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执行的战略方案即来源于此。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1840年8月9日），侵华英军总司令懿律（G. Elliot，义律的堂兄）和义律率领兵舰8艘驶抵大沽口。七月十四日（8月11日），义律乘驳船向清政府递交通牒。八月初四（8月30日），琦善在大沽口的帐篷中与义

律谈判。八月十四日（9月9日），琦善代表清政府基本上答应了英国通牒中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义律考虑到因季节关系无法发动攻势，遂同意返回广州继续谈判。此次40天的中英天津交涉活动史称“白河投书”。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长江以南的五个沿海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但是，这五个通商口岸的开放，并没有使整个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虽由战前的一口增加到了五口，但由于中国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结构的顽强抵抗，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额，除鸦片之外并没有增长多少，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出口反而大量增加，西方国家不得不输出白银来弥补差额。为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西方列强认为必须取得深入中国内地的更大自由。可以说，这是英法等国的积极筹划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列强明显感到，清王朝经过前次鸦片战争仍然顽强地拒绝加入世界秩序，因此必须再次使用武力使清王朝真正屈服。为达到长

期威胁清王朝的目的，列强意欲将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

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两国联合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三月初七（1858年4月20日），英法联军齐集于大沽口外。四月初八（5月20日），联军借口不满意清王朝的答复，进攻并占领了大沽炮台。联军军舰驶入海河，并于四月十四日（5月26日）抵达天津三岔河口。四月十八日（5月30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到达天津。

清王朝深知这次战争对津京威胁的严重性，尤其惧怕英法等国会以大沽为香港，天津为广州，因而不得不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四月十六日（5月28日），清廷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与四国公使谈判。在侵略者的威逼之下，桂良、花沙纳代表清政府于五月初三（6月13日）、初八（18日）、十六日（26日）和十七日（27日）在天津的海光寺分别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赔款；各国公使驻北京；扩大领事裁判权；基督教和天主教可以进入内地自由传教；加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汉口、九江、镇江、台湾府（台南）、淡



水、汕头、琼州和南京等10口为通商口岸。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于六月初七（7月17日）撤出天津。

交战双方对《天津条约》都不甚满意，咸丰帝更是对公使驻京一条深恶痛绝。他命令桂良等人在上海与各国谈判议定海关税则时力求补救，阻止公使驻京。与此同时，清王朝还利用天津为非通商口岸的有利条件，在大沽口严密布防，派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重兵、调巨炮把守大沽炮台，只允许各国公使从北塘登陆换约。

英国政府和大资产阶级认为，天津同已被开放口岸一样重要，而《天津条约》未能将其列入是严重失策，遂决定在换约时使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英法联军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采取强制通行的军事行动，清除海河口的障碍物，以保证公使前往天津。由于轻敌，再加上清军的充分准备，妄图闯入大沽口的英法联军军舰遭到重创，被击沉4艘、击伤4艘，英法两国公使只好返回上海。

英法联军在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后不甘失败，很快重组兵力再次进犯。此时，清政府还

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因而疏于防范。咸丰十年六月十五日（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并于七月初五（8月21日）占领大沽南北炮台。七月八日（8月24日），联军军舰驶抵天津东门外，次日便占领了天津城。

英国最高专使额尔金（Earl of Elgin）向清廷谈判代表提出：清政府必须赔偿英法两国各800万两白银；英法带兵进京换约；立即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咸丰帝对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认为尚可商议，但对赔款和带兵进京两项则坚决不允。

英法联军见奢求不能得到满足，遂于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并于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占领北京，焚毁圆明园。此后，清王朝派恭亲王奕訢为谈判代表，分别于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和十二日（25日）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并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天津被迫开埠。

单就港口的自然条件而言，天津不如附近港阔水深的秦皇岛。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政府为建立一个足以威胁北京的基地，遂

放弃了秦皇岛，坚持将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可以说，天津开埠的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这一点与上海开埠恰恰相反。

天津被迫开埠后，外国侵略者在天津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划租界。咸丰十年（1860年）和十一年（1861年），英、法、美三国分别在天津设立租界。此后，清政府先后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战败，又被迫同意德、日、俄、意、奥、比六国在天津设置租界，九国租界由此并立于天津。天津也因而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一座拥有如此众多国别租界的城市。

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侵入，天津人民掀起了以反洋教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行动，其主要代表为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爆发的以火烧望海楼教堂为标志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虽代表了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但究其根本来说，则是西方传教士背离教义欺压民众，导致的天津百姓群体反抗行动。

同治九年八月初三（1870年8月29日），清王朝将更懂得“夷务”事项的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不久，清政府特设北洋通商大臣，并由直隶总督兼任，同时规定：直隶总督每年春季

开冻后移驻天津，冬令封河后再回省城保定。如遇紧急事件，必须回保定料理，总督于事毕后仍赴天津。但由于天津的特殊地位，李鸿章自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很少回保定，基本上都在天津办公。

李鸿章在天津兴办、扩建了一系列洋务企业和近代教育设施，如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天津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天津铁路公司、天津电报总局、天津邮政总局、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电气水雷学堂、天津管轮学堂、天津医学堂、天津自来水公司、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等。此外，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亦诞生于天津。“洋务运动”使天津进入早期近代化的第一阶段，天津的工人阶级也从此诞生。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代表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了不少国际条约，如《中日修好条约》、《中日通商章程》、《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中秘友好通商条约》、《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等，天津遂有“第二首都”之称，位于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也被西方人士称为中国



的“第二政府”。

清王朝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变法图存的维新思想蔚然兴起，天津成为维新思想的发源地。其代表人物严复在天津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名学浅说》、《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以激励国人自强保种。

鉴于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编练新军的要求，清政府也认识到旧军队既不能镇压人民起义亦无法抵御外敌入侵。为维护统治，清廷被迫开展新式建军运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1月22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新式陆军——定武军诞生。这只新军由淮系官僚、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任统帅，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时任北洋海军总查的原德国陆军上尉军官汉纳根（Von Hanneken）任总教习。该军最初在天津府青县马厂编练，后因马厂兵营狭小，遂移驻小站原淮军“盛字营”遗留的营盘中，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由此拉开序幕。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

清廷命时任浙江温处道的袁世凯接掌“定武军”，并将“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定武军和新建陆军均采用德国模式编练、装备军队，并延聘了大批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各级官佐，从而形成了“小站班底”。民国成立后，其中许多人成为北洋军阀。“小站练兵”开创了我国近代陆军的先河，对其后我国军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借鉴与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另一只新式陆军——武毅军在今宁河县芦台镇编练。该军由聂士成统帅，亦采用德国模式训练、装备军队。

清末新式建军运动中，共编练成5支新式陆军（定武军、新建陆军、自强军、武毅军和湖北护军营），其中有3支（定武军、新建陆军、武毅军）是在天津地区成军的。

随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企图的不断明朗，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拳民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并迅速波及天津。拳民们在天津城内建立了众多的“坛口”。为镇压中国民众的抵抗，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保护侨民”为借口，组成了八国联军，相继攻陷天津、北京，并在天津成立了全部由外国人组成的“管理津郡城

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都统衙门”）。天津由是成为中国内地唯一的一座完全殖民城市。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日、俄、法、德、意、奥、比、西、荷十一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即《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白银4.5亿两；在北京划定使馆区；拆除大沽炮台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当时天津地区共有22座炮台）；外国军队可在自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沿线12个地方（含天津地区的杨村、塘沽、芦台、军粮城）驻扎军队等。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英、美、法、俄、意、奥、德、日各国分别在天津各自的租界中驻扎军队（只有比利时在天津租界中没有驻军）。其中，日本在天津设立“清国驻屯军”（民国成立后更名为“中国驻屯军”〈亦名“天津驻屯军”和“华北驻屯军”〉），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辛丑条约》签订时，天津仍处于都统衙门的统治之下，八国联军可以随时由津入京，威胁清朝廷。为此，正在返京途中的慈禧和光绪谕令议和大臣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要求他们加紧与各列强磋商，务必早日收回天津。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李鸿章因病去世，清廷任命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9日实授），继续催办接收天津事宜。

都统衙门在得知各列强准备将天津交还清政府后，为确保其合法性，遂于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1902年4月3日）召开特别会议，制定了移交天津的“建议书”。三月初五日（4月12日），各列强国家驻津司令官召开会议，提出了归还天津的二十九项“条款”，其中第四项规定“距联军占领之天津街市三十基罗迈当（公里）以内，中国不得置守卫兵”。根据《辛丑条约》，外国军队有权在山海关至北京的12个地区驻扎军队，但中国军队在天津的驻扎权并未就此取消，而前项条款无疑是将中国军队最终阻绝于天津城区范围之外，其规定大大超过了《辛丑条约》划定的范围。虽然，由于中国政府的坚持，以及列强间彼此掣



肘，矛盾日深，各签约国最终不得不同意清政府的要求，将中国军队不得驻扎的范围由30公里改为10公里，但总的说来，中国军队丧失天津控制权的局面并未改变。该款项限制了中国军队应尽的保卫领土主权的义务，更为日后各帝国主义对天津和华北、东北进行的军事侵略创造了条件。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收天津，从而结束了都统衙门长达两年的军事殖民统治。此后，袁世凯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使几近崩溃的天津经济得以复苏。其具体措施主要有：发展实业、开发新市区、创办巡警、兴办新式学堂、改良司法制度、试办地方自治等。“北洋新政”使天津的早期近代化进程进入到第二阶段。

“武昌起义”后，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为推翻清王朝统治，天津的革命党人发动了“天津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参议院曾投票表决新都问题。由于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天津与北京、南京均榜上有名，由此

可见当时天津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此后，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围绕在何处宣誓任职的问题爆发了矛盾。为造成北方局势混乱，须臾难离的假象，袁世凯指使天津镇守使张怀芝发动“天津兵变”，迫使革命党人同意其要求。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8年），地方行政建置被精简为省、县两级，天津府被裁撤，天津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为天津县，地方军事长官为天津镇守使。1913年，天津成为直隶省省会，天津各项事务基本由省级机构或民政长（后更名为巡按使、省长）直接办理。天津县只作为辅助性机构，完全秉承省级机构的旨意行事。

民国时期，天津因存有九国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遂成为各派势力角逐之所。居住在租界中的末代皇帝、遗老遗少、下野军阀、失意政客，为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勾连倾轧，纵横捭阖，掀起众多政潮。如督军团五次会议、张勋复辟、天津四巨头会议、直系军阀天津会议、直奉军阀天津会议、天津蔡园会议、临时执政府上台、安国军政府上台等，这些事件曾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

天津具有这种独特政治作用，故而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北京是前台、天津为后台”的说法。

与此同时，这些达官显贵为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在租界内纷纷建起各种风格的豪宅以供享乐。据统计，自1912年至1937年

“七·七”事变前，共有500余“社会名流”寓居天津租界，其中就包括北洋军阀46人、北洋政客30人。另据天津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目前天津共发现近代建筑800余幢，其中仅名人故居就有100多幢。这些名人故居与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迥异，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主席就曾以“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来形容两市的建筑特点。

在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天津亦出现了不少闪光点，如直刺袁世凯称帝的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梁启超先生在天津写成的；又如天津人民反对法租界当局强占老西开地区而掀起的反帝斗争；觉悟社、女星社等爱国学生革命团体的成立；特别是1924年7月，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诞生，成为此后天津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运动中最坚强有力的领导者。

1928年6月，国民党取得第二次北伐战争的胜利，占领了天津和北京。同月21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法令，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天津定为直属于行政院的特殊市。从此，“天津市”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从清同治九年八月（1870年8月）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至1928年6月北洋政府覆灭，近60年间，天津的政治地位远远高于经济地位，成为中国仅次于首都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同时，又因地当京师门户，天津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其军事地位亦高于经济地位。由于所具有的重大政治、军事与经济意义，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天津的影响力超过了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城市。1928年6月北洋政府统治结束后，中国的政治中心移至南京、上海一带，天津的政治、军事地位逐渐衰落。

与政治、军事地位衰微相对的是，此时期天津的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天津劝业场、仁立纺毛公司、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等一大批工商业企业应运而生，天津最终成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

为实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大陆政策，日